

知识的社会判断与高校青年教师日常性的回归 ——对甘阳教授遇袭事件的反思

■ 卢德平

(北京语言大学 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3)

【摘要】甘阳教授遇袭事件构成了高校教师日常性双重回归的契机: 社会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判断纠正了神圣化的偏向, 回归到社会功能的角色分布视角; 高校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本身也逐步走出传统知识分子“经世济民”的神圣领域, 而回归作为社会人的正常或普通的社会群体范畴。在这个双重回归过程中, 对于高校教师所代表的知识人的类型化框架需要变革, 由此形成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对称性社会互动, 并辐射到其他社会场域, 恢复不平等社会结构下的平等社会互动, 从而确立新的社会团结。

【关键词】 高校教师 知识分子 日常生活 对称性社会互动

2016年1月7日,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召开年度教职工考核工作会, 青年教师李思涯当场掌掴博雅学院院长甘阳。事件发生后, 不仅学界哗然, 也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无论孰是孰非, 这一发生在高校教师之间的“暴力”事件都关乎“斯文”^①。由此甘阳教授遇袭事件揭开了当代中国高校教师群体的面纱, 而这一事件的新闻性恰恰在于对高校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社会界定与这一群体真实性之间发生了断裂。断裂本身早已是事实, 而这一事件的新闻性正好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对于青年教师在内的高校教师重新类型化(*typification*)^[1]的机会, 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说这是件好事。说它好就在于不是从任何道德评判的意义上立论的, 也非就当事人本身提出任何带有偏向的立场, 而是事件本身为中国社会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反思机会, 也为人们围绕知识和知识分子形成一种更符合日常生活范畴的类型化结果提供了机会。这个机会带来的是对于日常性的双重回归: 社会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判断纠正了神圣化的偏向, 回归到社会功能的角色分布视角; 高校教师本身也逐步走出传统知识分子“经世济民”的神圣领域, 回归作为社会人的正常或普通的社会群体范畴, 获得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说的现代社会中的“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2]的定位。甘阳教授遇袭事件将这一命题凸显出来, 这将有助于推动社会大众和高校教师形成走向社会真实性的双向认识。

甘阳教授遇袭事件揭开了中国高校教师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的神圣假象, 还原了这一社会群

收稿日期: 2016-02-09

作者简介: 卢德平,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教授, 文学博士(日本), 主要研究符号学理论、汉语国际传播。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一带一路’关联合国主要社会场域汉语传播的推拉因素及其对传播过程影响的研究”(课题编号: 15JJD740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有关甘阳教授遇袭事件的新闻报道, 参见 http://news.ifeng.com/a/20160109/47006856_0.shtml, <http://news.sohu.com/20160125/n435775975.shtml>

体的世俗面目。中国知识分子的神圣假象形成于传统的社会辨识框架,也形成于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类自我宣言式的话语风格,还形成于当代精细的社会分工所孕育的霸权型专家知识体系和知识本身的神圣性假象。但是,无论传统的社会辨识框架,还是自我宣言式的话语风格,抑或霸权型的专家知识体系,都蕴含着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与工具性社会领域的脱节,以及由此形成的与社会众多阶层的隔离。如果这一事件能够让中国高校教师所代表的知识人改变熟悉的陌生人的社会定位,那么对于中国社会重新确立高校教师的辨识框架,把知识的神圣性转换为一般劳动分工的边界效应,以及褪去神圣光环的符号标志,从而促进知识的广泛传播、建立人与人之间更多对称性的社会互动关系,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目前高校青年教师的社会构成

高校教师的社会性构成包括诸多要素:作为知识人的知识性维度(普遍知识和专业知识);在家庭场域中作为父母、儿女、夫妻的家庭成员维度;在工作场域作为教育机构雇员的组织成员维度;在职业活动场域作为教师的职业维度;在一般社会场域作为消费者、旅游者、参会者等的社交性维度;在非公共、非正式场域作为朋友、路人的个性或品格维度;在社区场域作为普通业主的邻里维度等。但是,由于其中部分社会性维度,特别是作为知识人的知识性维度的高扬和泛化,高校教师的其他社会维度长期以来遭到遮蔽,甚至在社会类型化结果中几乎消失殆尽。对高校教师的这种类型化结果,无疑也使得类型化的对象相应地丧失了他/她的社会真实性。

在整个高校教师队伍中,青年教师的诸多社会维度更多处于逐步确立的过程之中,社会类型化的遮蔽结果反差更大,他们的反弹也更强烈,而对于部分老教师来讲,部分社会性维度的建设已经完成,甚或消失。具体而言,对于一名老教师来讲,知识性维度可能已经建立完毕(即所谓功成名就);在家庭维度上可能也不再扮演儿女的角色(上无老可养),从而简化了家庭维度的内容;在工作场域拥有根深蒂固的人脉关系,或掌握着机构的权力,所谓的组织成员维度完全确立;在一般社会场域,通过长时间的积累,已经建立相对稳定的社交圈子;在非公共、非正式场域,历久形成的传记经历已经让朋友圈拥有稳定的互动关系,对于其个性和品格也有着充分的宽容和接纳;在社区场域,老邻居、老街坊之间多年的互动甚至延续到下一代身上,从而有效地降低了城市作为陌生人社会所形成的日常社会互动风险。与此形成鲜明对照,青年教师群体在上述各个社会场域的社会性维度的建设上都处于相对初步的阶段,更谈不上丰富和成熟的社会性。

甘阳教授遇袭事件所揭示的仅仅是在各种社会性维度中,高校教师作为教育机构雇员的组织成员维度长期被社会所遮蔽的现实。随着有关高校教师的众多新闻事件的披露,这一群体其他遭到遮蔽的社会性维度也将一一凸显出来,也有可能成为新闻热点。如果是这样就充分说明,中国社会所形成的类型化结果对于高校教师的社会性维度遮蔽到何种程度,其复原任务是何等迫切和艰巨。

在作为教育机构雇员的组织成员维度中,高校教师同样面临着其他非教育机构的雇员所面临的组织成员资格的社会复杂性。其中既包含着对组织的归属意识、与组织形成的劳资契约关系,也包括与同事和上级建立的受组织制度约束的工作关系,所有这一切要素都浓缩于组织公民权(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概念中。组织公民权概念的内涵包括权利和义务两方面,而一定的组织体系围绕程序正义和分布正义确立合理、合法的规则,是实现组织公民权的前提条件。一个组织如果采取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非连贯、不一致的管理方法,则违背了分布正义原

则,容易在组织内部造成新成员和旧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如果把这些办法固定成文,甚至在实践过程中搁置相关正式条文,则违背了程序正义原则。对这两条公平原则的违背,将造成对组织公民权的严重损害。甘阳教授遇袭事件的焦点恰恰就是青年教师的组织公民权长期遭受漠视、甚至损害的结果。

组织公民权的确立,需要满足程序正义和分布正义两条组织原则,但组织公民权的维护有赖于组织成员之间对称、理性、公开、透明的社会互动关系。如果一个组织分化为更小的利益圈子,形成过多的小群体,且群体间信息不对称,互动困难,则无法建立整个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从而削弱组织的整体力量。从这一角度说,组织公民权的实现和维护需要对互动公民权(interactional citizenship)^[3]的实践过程加以保障,而互动公民权的实质就在于组织成员之间形成对称、理性、公开、透明的社会互动关系。甘阳教授遇袭事件正是暴露出中国高校在组织生态系统存在上述内在问题。这个事件也折射出中国众多组织体系的基本状况,让社会公众不仅看到大学围墙内部组织生态体系与其他组织的相似性,也看到了在围墙内部封闭着的大学教师与千千万万个普通社会成员一样,同样面临着实现和维护组织公民权以及日常社会实践所需要的互动公民权的困难。这将催生出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的动力。

如上所述,高校教师的社会性包含多个维度,而问题还在于,这些维度之间存在着一个更接近社会真实性的逻辑顺序,而目前的社会类型化和初始框架结果,可能违背了这一逻辑序列。高校教师作为社会人的社会性维度,其合理的逻辑序列可能是家庭成员维度、组织成员维度、社交性维度、个性或品格维度、邻里维度,最后才是作为知识人的知识性维度,而不是将知识性维度置于高校教师社会性维度的首位。对这个社会性维度序列的改写,牵涉到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也牵涉到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改写的阵痛是巨大的,但改写的结果将有助于恢复高校教师的日常性和作为社会人的基本构成,也有助于整体社会生态体系的优化。

二、高校青年教师日常性的回归

社会对高校教师重建起符合其真实性和日常性的类型化范式,高校教师在与其他社会领域成员相遇的过程中形成对称性社会互动关系,并对面临的社会情景做出符合社会期待的界定,都属于高校教师恢复其日常性、丰富其社会性构成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葛兰西所提出的“有机知识分子”概念,诉求的不是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以知识为手段,以多元视角为特长,对社会所实现的超越,以及在社会功能和阶级类别上的无所依归的游离状态,而是深度卷入社会行动,有机参与社会劳动分工,以实现自身更高的社会真实性;只有实现了更高的社会真实性,知识人与社会之间才能共享背景期待,确立视角的相互性,并形成相互理解所需要的共同元素和解读脚本,使知识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一起组成真正“我们”的范畴,从而摆脱知识人的“他者性”(otherness)。甘阳教授遇袭事件再一次凸显了高校教师的“他者性”以及“他者性”概念所蕴含的对社会日常性的遮蔽。同时也说明今日中国高校的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已不再适合划归于传统知识分子的范畴,而应该更多给予其社会学的观照,以充分恢复其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人的属性。如果这一事件能够有助于高校教师摆脱“他者性”的束缚,在社会群体定义体系里恢复其日常性的话,则是高校教师再度融入社会、与其他社会成员建立和谐关系、进入社会中“我们”范畴的良好契机,这个契机对于成长中的高校青年教师而言无疑更加重要。

社会真实性只有以行动者置身于生动的日常生活为前提才能成立。对日常性的回归,是高校教师和其他社会成员在生动的日常生活中重新定位自身并重构二者关系的重要条件。回归日常性,以生动的日常生活坐标来界定一切社会行动,是实现行动者真实性的必然途径。生动

性和真实性的呈现是高校教师走出孤独的象牙塔的重要途径,同时又构成其他范畴的社会成员重新判断和界定这一群体的依据。中国社会所缺少的恰恰就是对于高校教师真实性和生动性的把握。或者说,关于高校教师所形成的既有真实性判断,是把高校教师作为知识人而排除其日常社会属性的一种准真实性或伪真实性判断。这个判断的偏离,不是由于社会公众的无知,而是关于知识神圣性(“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形成的传统文化观念去除了知识人的日常性导致的结果,也是知识人的书斋与其他社会场域高度隔离而导致其日常性和真实性无法呈现的结果。

但社会确立一种新的真实性意识,高校教师建立一种新的真实性认同,对于高校教师和其他社会成员无疑都要付出不小的代价。这个代价在于传统上形成的关于高校教师所代表的知识人的类型化框架需要解体,重构一种以恢复知识人日常性为前提的新的类型化框架。这个类型化框架的变更,不仅在于一种由传统所固化的观念范式需要发生变化,而且在实践上,也将影响到知识的社会化过程及其结果。在当今的中国,知识的社会化过程集中表现在教育场域,并且与中国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构成和以知识教育为引导的代际传承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所以,要推动一种作为社会意识基础的类型化框架的变革,无疑牵涉到社会观念体系的本体安全,其代价是巨大的。甘阳教授遇袭事件,包括被袭击的甘阳教授本人,以及被解聘的实施袭击行为的青年教师,不过是扮演了这一代价的替罪羊角色,并通过新闻媒体放大的符号化过程,显得既悲剧、又悲壮。

在生动的日常生活中实现的日常性,包括生理、心理、社交、家庭、职业、经济等日常生活的要素,且经由这些日常生活要素的交互作用而彰显出来。只有日常性才能把人从观念或范畴的状态转换为具有生理特征、心理情绪、人际互动、家庭角色、职业类型、经济状况等丰富、生动的细节的具体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社会成员对于高校教师所做的判断,以及在判断过程中建立的类型化框架完全脱离了认知对象的日常性要素。问题只是在于,社会公众所判断的高校教师包含的日常化要素根本上不同于其他众多社会群体的日常化要素构成。超出常规的受教育时间构成了高校教师共同的社会学属性^[4],超出常规的阅读和写作,以及由此积累的超常规的知识,达成了关于高校教师的一般社会共识。在这样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共识笼罩下的高校教师,被普遍认为应该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群体的日常性特征,其诸多日常性特征被普遍弱化、淡化,甚或排除出相关的社会范畴。关于这一点的社会共识很多已经成为结论性判断。由此形成的关于高校教师的判断具有很多理所当然的成分,而这一点导致社会成员诸多判断远远偏离了这一群体的社会真实性。

人们普遍认为,高校教师已经从日常生活中撤退到书斋,有充分的能力,也有充分的知识条件,用理性代替情绪,用精神代替物质,用思想代替行动,用灵魂代替欲望。按照这样的理解,吵架、斗殴之类的人际冲突应该得到知识理性的约束,拥有知识所带来的尊重应该淡化科层阶梯意识,对真理的追求应该超越对金钱的渴望,反之,则属于不应该发生在高校教师身上的现象。诸种“不应该”是一种观念的限制,也是一种道德判断,而且二者结合在一起。正如卢曼(Thomas Luckmann)所指出,现代社会中的道德构成,在成立的条件和形成过程上,根本不同于传统社会的道德体系。传统社会的道德体系来自政治、宗教或知识的权威,如封建君主、宗教神职人员、社会仪式的司仪,甚至也包括博学多识之士。传统社会中道德形成过程的单一性决定了统一道德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这种统一的道德体系构成了传统社会秩序的维持手段。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多元性,面对多元性的社会现实,传统社会的统一道德体系走向瓦解,而代之以基于社会互动过程的道德实践,即道德交流(moral communication)。道德在现代社会中是通过日常的社会人际互动而形成的^[5]。这和传统社会源自单一的道德权威而构成的社

会通用道德体系迥然不同。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日常社会实践生成着道德的要素,并以相关道德规则指导日常生活实践,而其中社会互动构成了日常社会实践的典型形式。

但是,当社会互动在某些社会群体之间无法发生时,因互动而共享的道德实践即所谓的道德交流就无法实现。在此前提下,相关社会群体之间的判断只能依据道德迁移的方式,即借用与其他社会群体的互动实践所形成的道德评价结果。甘阳教授遇袭事件的新闻性,恰恰在于高校教师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无法建立有效的道德交流,同时其他社会群体又不倾向于采取道德迁移的方式来评判高校教师群体,造成关于高校知识分子的既有道德判断与这个事件所揭示出的当事人的真实性之间发生明显的脱节,从而形成新闻热点。

当甘阳教授遇袭事件不再具有新闻价值时,就意味着传统上关于高校教师形成的既有道德判断完全改变,而高校教师在这个既有道德判断范式变化的过程中获得的回馈则是生活日常性的恢复。高校教师不再是传统的知识人,因此不需要再承受关于知识人的传统道德判断,而变得和工人、农民、公司白领、机关职员一样,不过是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一个功能项,其知识的神圣性,如同农民耕地的灵活性、工人摆弄车床的娴熟度、公司白领推销商品的口才、机关职员的人事平衡技巧,都不过是社会分工壁垒造成的陌生效果,这对于高校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未尝不是件好事。

高校教师对生活日常性的回归,是对社会分工体系的回归,也是对社会一般成员资格的回归。这个回归虽然存在观念和道德的条件,但回归的实现,有赖于日常生活互动的实践效果。只有高校教师能和矿工、农民、卡车司机、售货员、保安等进行日常的互动,只有后者不再把高校教师视为超越于日常生活场域的知识人,而将其视为一个中年人或青年人、一名养家糊口的劳动者、一位父亲或母亲、一个外向或腼腆的男人或女人、一个普通的对话者、一个有着交流乐趣的交流者,才能说高校教师获得了生活的日常性。

高校教师回归生活日常性的结果,同时又是构成其社会现实性的条件,一个重要的表现在于社会对高校教师的重新类型化。舒尔茨(Alfred Schütz)所提出的这个哲学社会学概念与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初始框架”(primary framework)概念在理论指向上异曲同工,揭示了这样一个社会互动的规律:人们在实施社会互动之前,甚至也包括整个社会互动过程,都需要对互动的对象进行一个基本的范畴化和类别化,也就是对互动对象的基本社会属性做出判断,以选择是否进入社会互动过程^[6]。社会互动过程中的这种范畴化、类型化、框架化的能力既来自社会互动成员以往的传记经历,即所谓的人生经验,也来自传统、习俗,以及同时代的社会结构的系统的规定。如果对于互动对象的初始框架或类型化排除了该对象,也就是说判断为不是打交道的对象,不是交流的对象,不是分享的对象,则互动者倾向于撤出互动过程。随着交流者从互动过程的撤出,交流即告中止,面对面相遇(face-to-face encounter)所形成的相互理解机会也随之消失。这就是“说不上话”、“打不了交道”、“话不投机半句多”、“没有共同语言”之类社会互动不成功的现象。

由此可知,人们在社会现实中实施一定的社会交往行动,都不可避免地以一定的类型化结果或初始框架为基本的判断参照,否则社会交往就成为一场完全随机的冒险,其冒险的结果可能包括情感挫折、价值定向失败、时间浪费等,而这个风险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所不愿承担的。不仅如此,类型化过程还受到传统、习俗甚至制度的支持,累积而成社会行动的必备知识。类型化的知识是社会成员做出判断、进行选择、反思既往、展望预期的行动框架和坐标,并且深深扎根于社会群体的价值系统之中。

当长期形成的类型化框架发生变化时,人们会对面临的社会情景发生定义困难,对相关社会情景的构成要素及其关系的变化产生错愕,对社会情景背后的价值观产生认知和认同的困

惑^[7]。这样的困难、错愕、困惑导致社会成员虽置身于相关社会情景中,但无法准确界定社会情景的性质,无法确定自身在新的社会情景中的定位,无法在相关的社会情景中实施有效的社会行动,也无法和置身于同一社会情景中的其他社会成员形成有效的社会互动。合理的类型化是社会情景定义的基本条件。当高校教师进入相关社会场域,置身于一定的社会情景,其类型化的结果与高校教师的真实性吻合时,才能形成与其他社会成员的积极互动,并通过这一社会互动过程展示自身的真实性,与其他社会成员建立生动、日常、和谐的伙伴关系,这是高校教师回归生活日常性的正确途径,也是社会了解和理解高校教师群体的必然选择。

对高校教师的重新类型化,不需要公众发挥过多的想象力,但需要社会公众改变长久形成的对于高校教师的类型化范式。这无疑会在价值观层面上触动社会成员的本体安全意识,对于整个社会无疑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对于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将子女的教育置于家庭生活首位的努力也会形成极大的影响。虽然目前无法从经验上评估这些影响的程度,但随着既有的社会类型化结果与知识人群体真实性之间的断裂现象不断被披露,或者以戏剧化的新闻事件不断呈现,对于高校教师群体所代表的知识人的重新类型化,就变成一项非常紧迫的社会建设任务。

这个社会建设任务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在对高校教师重新类型化之后,高校教师和其他社会群体之间才有可能建立一种对称的社会互动关系,同时辐射并影响到其他社会群体,推动整个社会朝着建立普遍的对称性社会互动关系的目标而努力。在政治权力、经济条件、社会角色声望存在不平等现象的当代中国社会,急剧的社会分层正在强化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防御心理,增加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互动和交流的困难,跨社会阶层的沟通面临严重的失语趋势。对高校教师的重新类型化,实质上就是要以生活的日常性为归属点,削减社会互动过程中的权力因素、财富因素、声望因素,将社会互动过程中的利益交换更多转换为基于人的社交性、日常性、社会性的人际交流。在这样一种社会建设的目标下,高校教师与社会其他群体之间对称互动关系的确立,将破除知识的神圣性和神秘性,让更多的社会成员分享知识、交流知识;同时,高校教师群体也将在和其他社会群体的有效互动之中,体会到知识人圈外更宽阔的社会空间的生机和活力。

三、走向新的整合

高校教师回归生活的日常性,实质上是对生活的深度回归,也是高校教师作为社会人属性的恢复。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作为知识人的高校教师原来不具备这种生活的日常性和相关的社会属性,而是社会类型化的偏向,对高校教师组织公民权和互动公民权的漠视,社会性维度合理序列的错位等,遮蔽了高校教师的日常性和社会性。在这个过程中,高校教师与生动的社会生活脱节,社会成员也依据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无意识地隔离高校教师。但无论脱节还是隔离,既不利于高校教师的成长和发展,也无益于社会的进步。一种符合时代道德的选择,只能是高校教师作为知识人与更日常、更广阔、更丰富的社会形成有机的整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当然,整合的过程是艰难的,但一个人性丰满的社会需要这样的整合。

这种面向社会的整合又是一种富有意义的社会行动,且具有鲜明的过程性。赋予这一社会行动以重要意义的,首先是高校青年教师自身。只有将这种新的社会整合行动理解为一种新的自我价值的表达,并在整合的过程中体会到生活所具有的崭新意义,青年教师才会产生整合的动力。这个整合不是出于任何外部的强制力量,而是基于青年教师主体重新诠释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之后形成的一种内源性动力。但是,整合的必要性恰恰又在于青年教师的整合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整合行动,与社会对于青年教师在重新类型化之后产生的新的期待相一致。当然,

由于整合行动达成上述主客体的一致是一个不断调适、修正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而决定了高校青年教师的这一新的社会整合具有鲜明的过程性。在这一整合过程之中,包括高校教师在内的社会多元行动者都将做出应有的贡献。这一贡献不是社会对于高校教师的恩惠,而是一种基于共同体精神的道德责任。

有效的整合结果应该是中国社会建立起一种符合时代特征,并具有未来指向的新的教师类型化框架,而高校青年教师自身也将以这一新的类型化框架来界定自己的生活坐标。这个新的类型化框架包容高校教师的所有生活日常性和生动性,体现高校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群体的内在普遍性和必然性,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权宜策略。

虽然高校青年教师的整合是一种基于社会发展内在规律要求的社会行动过程,而不仅仅是由于甘阳教授遇袭事件形成的情景化行动。但是,对于任何一种面向社会进步、符合现代知识人的社会功能特征的社会整合行动,都不能简单采取听其自然的无责任态度。一种有责任的合理态度,应该是发挥社会行动者的能动作用,顺应重构社会类型化框架的内在合理性和规律性,有意识地推动这一社会整合过程。推动建立这一新的类型化框架,也将缩短其自然演进的进程,优化高校青年教师发展的社会空间。

在高校青年教师的整合过程之中,作为社会多元行动者构成的核心力量,显然是高校教师所服务的组织机构。高校中的密切关联人群,包括青年教师的同事、学生、大学管理层,以及相关的教学和科研组织,都是这一核心力量的组成部分。大学需要朝着符合社会期待的方向,为建立一个包容而非排斥、有生成活力而非僵化刻板的社会类型化框架提供必要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要素应包括:建立符合社会评价尺度的教师薪酬体系、晋升标准,优化青年教师的学术和教学生态系统,同时要改革已有的管理体制。当然,对于青年教师的新的责任约束体系也要同步建立。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关于高校教师的社会类型化框架,才能成为一种既有传统继承,又更具现代化特征的社会建构,而这个社会建构将构成整个社会变革的有机力量。

一种符合社会期待、有助于革新社会类型化框架的制度设计,才是促进社会进步,并为之提供法理保障的制度,其核心内涵在于最大限度实现社会正义。围绕高校青年教师的整合过程而形成的诸种教育制度安排,不能构成例外。

[参 考 文 献]

- [1] Alfred Schutz . Collected Papers(1) : 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 Maurice Natanson ed.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62 , pp. 283 - 285.
- [2]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Quintin Hoare & Geoffrey Nowel Smith eds. & tra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 pp. 5 - 25.
- [3] Paul Colomy and J. David Brown. Goffman and Interactional Citizenship,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1996, 39(3).
- [4] Karl Mannheim . Ideology and Utopi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 London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36 , p. 138.
- [5] Thomas Luckmann. Moral Communication in Modern Societies. Human Studies. 2002, 25 (1).
- [6] Erving Goffman. Frame Analysis,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1 - 39.
- [7] William I. Thomas and Florian Znaniecki. 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Boston: Richard G. Badger The Gorham Press. , 1918 , pp. 40 - 41 , 68 - 70.

(责任编辑:张宇慧)